

现代化背景下的第三次分配： 慈善捐赠重构与创新

刘振杰¹, 刘家琪²

(1.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 北京 100721;

2. 澳门科技大学商学院, 澳门 999078)

摘要: 聚焦中国第三次分配慈善转型, 分析数字化、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的挑战, 即数字技术引发算法偏见与“数字鸿沟”; 代际冲突推动慈善社会组织转向“价值共创”; 全球化资本加剧资源失衡。基于国际经验, 构建“制度—技术—文化”多维协同框架, 通过慈善创新实验区、社会效益证券化及区块链技术, 破解制度滞后、技术异化与文化断层。核心路径涵盖精准需求匹配、平台化生态重构与资本证券化, 平衡创新与伦理, 推动慈善资源向“再生型”转化, 助力共同富裕。

关键词: 第三次分配; 慈善社会组织; 数字化; 多维协同; 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 C913. 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66(2025)06-0064-11

Third distribution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re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of charitable donations

LIU Zhenjie¹, LIU Jiaqi²

(1. Policy Research Center,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Beijing 100721,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Mac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o SAR 999078, China)

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third distribution of charity, analyzing the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digit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namely the algorithmic bias and “digital divide” triggered by digital technology;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 pushing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to shift towards “value co-creation”;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resource imbalance caused by globalized capital. Based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 multi-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technology-culture” is constructed. Through charitable innovation experimental zones, social benefit securitization and blockchain technology, the problems of institutional lag,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and cultural discontinuity are solved. The core paths include precise demand matching, platform-based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and capital securitization, balancing innovation and ethics,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aritable resources into “regenerative” forms, and facilitating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China's third distribution;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digitalization; multi-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common prosperity

收稿日期: 2025-03-17 修回日期: 2025-05-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慈善治理体系研究”(19FSHB016); “过渡期后低收入人口常态化救助帮扶机制研究”(24BGL260)。

作者简介: 刘振杰(1973—), 男, 河南周口人,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管理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公益慈善等。通信作者: 刘家琪。

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将公益慈善事业提升至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维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为慈善事业的现代化转型锚定了政策方向。在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的背景下,第三次分配作为调节社会财富、促进共同富裕的核心机制,正面临数字化、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的多重挑战与机遇。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公益慈善事业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维度,强调其对社会公平与资源再分配的关键作用。然而,当前中国慈善捐赠的现代化转型仍面临结构性矛盾:数字技术虽提升效率与透明度,但算法偏见、数据垄断催生“数字鸿沟”与伦理困境;代际价值观冲突倒逼慈善组织从“道德驱动”转向“价值共创”,而全球化资本流动的“选择性正义”加剧资源分配失衡;制度滞后、技术异化与文化认知断层进一步制约慈善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制度—技术—文化”协同框架,系统剖析慈善捐赠的现代化路径。通过案例分析与国际经验对比,揭示精准需求匹配、平台化生态重构及慈善资本证券化等核心趋势。同时,批判技术依赖导致的人文价值弱化与伦理风险,提出设立慈善创新实验区、构建社会效益交易所、普及“科学慈善”教育等本土化对策。本文的研究旨在平衡技术创新与伦理约束,推动慈善资源从“消耗型”向“再生型”转变,为优化第三次分配机制、构建兼具效率与人文关怀的慈善生态系统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一、现代化慈善捐赠的挑战与机遇

在数字化浪潮与社会转型的双重驱动下,中国慈善事业既面临技术颠覆、价值冲突与全球化失衡的严峻挑战,也迎来了精准化、平台化与资本创新等历史性机遇。技术重塑捐赠方式的同时,暴露了传统慈善的适应性短板,代际价值观的碰撞倒逼慈善组织重构叙事逻辑,而全球化慈善资本流动的“选择性正义”问题,因此急需构建跨国协同机制。本部分从技术、社会与全球维度切入,

系统分析现代化进程中慈善捐赠的困境与突破路径,为后续探索提供现实依据。

(一)技术颠覆与传统慈善的危机

数字技术的渗透彻底改变了慈善的参与方式。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正在重新塑造慈善捐赠的方式和渠道。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慈善捐赠领域催生了众多网络捐赠平台并创造了多样的公益慈善场景,显著提升了公众对慈善捐赠的认知和参与程度^[1]。《中国公益慈善数字化发展研究报告》^[2]显示,2017—2021年,中国居民通过网络和移动应用程序的捐赠总量显著增加,网络募捐平台所筹善款从25.9亿元跃升至100亿元,占整体社会捐赠总额的比例持续上升^[3]。传统“点对点”捐赠模式因信息不对称和效率低下而式微。例如,2023年腾讯公益平台数据显示,区块链技术使捐赠透明度提升至98%,而同期线下捐赠的透明度仅为63%。技术赋能让“指尖慈善”成为主流,但也引发算法偏见、数据垄断等新问题,如某头部平台因算法推荐偏向城市项目,导致农村公益项目募资成功率下降40%。区块链技术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分布式账本和智能合约功能。通过不可篡改的数据记录,捐赠者可以实时追踪善款流向,从资金募集到最终落地全程透明化。例如,蚂蚁链在“豫你同行”河南洪灾项目中,将每一笔捐赠的物资配送信息上链,确保救助过程可追溯。然而,技术应用并非万能,其有效性高度依赖慈善组织的数字化能力。许多中小型慈善机构因缺乏技术人才和资金支持,难以自主搭建区块链系统,导致技术赋能的覆盖面受限,形成“数字慈善鸿沟”。

技术颠覆还暴露了传统慈善机构的适应性短板。许多机构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组织架构僵化、决策流程冗长等问题。例如,某老牌慈善基金会在开发线上募捐系统时,因部门间协作低效,导致项目延期一年以上,错失关键筹款窗口。此外,技术依赖性可能削弱慈善的人文内核。当捐赠行为简化为“一键支付”,捐赠者与受助者之间的情感连接被弱化,慈善逐渐沦为“数据游戏”,背离其

利他主义本质。面对技术浪潮,需构建多方协同的治理框架。政府应推动公益数字基建普惠化,为中小机构提供低成本的云服务和技术培训;平台企业需完善算法伦理审查机制,避免技术权力滥用;慈善组织则应加强跨界合作,探索“技术+人文”双轮驱动模式。唯有在技术创新与伦理约束间取得平衡,才能实现慈善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二) 社会转型中的价值冲突

现代化催生的个体主义与慈善的利他内核产生张力。Z 世代捐赠者更关注“可见回报”,2024 年《全球青年慈善行为报告》^[4]指出,72% 的年轻捐赠者要求实时追踪善款流向,而传统机构仅能满足 31% 的需求。这种代际差异倒逼慈善组织重构价值叙事,从“道德驱动”转向“价值共创”。而慈善文化在社会中的普及能够极大促进资源的合理分配,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追求有着内在一致性。同时,资源分配合理与否也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大因素,因此在慈善文化促进资源分配合理的同时,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社会部分的“和谐”具有一致性^[5]。相较于传统捐赠者以“无私奉献”为核心理念,Z 世代更倾向于将慈善视为一种“社会投资”。他们对公益项目的参与不再局限于资金支持,而是追求情感共鸣、社会影响力甚至个人成长。例如,某公益平台推出的“公益积分”系统,允许捐赠者通过参与志愿服务或转发公益信息积累积分,兑换专属权益(如项目冠名权或线下活动参与资格),吸引了超过 80% 的年轻用户持续参与。这种模式将慈善行为从单向付出转变为双向价值交换,满足了年轻群体对即时反馈和个性化体验的需求。然而,价值共创的转型也面临伦理争议。部分慈善组织为迎合年轻捐赠者的偏好,过度包装项目故事,甚至虚构受助案例以博取关注。2023 年,某环保公益项目夸大“濒危物种救助效果”被曝光,导致捐赠者信任度下降 35%。此类现象反映出慈善价值叙事在商业化与真实性之间的失衡。此外,个体主义的强化可能削弱慈善的普惠性。例如,某教育公益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推送“高影响力”项目(如城

市名校捐赠),导致乡村基础教育项目募资占比不足 10%,加剧了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

技术赋能在缓解价值冲突中扮演双重角色。数字时代的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赋能^[6]。一方面,数字工具为价值共创提供了技术支撑。例如,虚拟现实(VR)技术通过沉浸式体验让捐赠者“亲临”受助现场,增强情感联结;区块链技术则通过不可篡改的善款流向记录,部分回应了年轻群体对透明度的诉求。另一方面,算法推荐机制可能加剧价值分化。某平台数据显示,基于用户兴趣的算法推送使城市中高收入群体捐赠占比提升至 65%,而低收入群体参与度不足 5%,进一步凸显慈善资源的阶层化倾向。面对这一挑战,慈善组织需构建包容性价值生态。数字公益慈善将成为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和重点^[7]。首先,应建立多元化的叙事框架,既保留传统利他精神,又融入年轻群体关注的参与感与成就感。例如,通过“公益+社交”模式,鼓励捐赠者以“公益大使”身份带动社群参与。其次,需强化伦理自律机制,避免为流量牺牲真实性。可借鉴国际经验,引入第三方伦理评估机构,对项目宣传内容进行合规性审查。最后,政策层面需推动慈善教育普及,通过校园课程和公共宣传重塑社会对慈善价值的认知,平衡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唯有如此,方能在社会转型中实现慈善价值的传承与创新。

(三) 全球化与慈善资本流动

跨境慈善捐赠规模在 2023 年突破 5 000 亿美元,但地缘政治加剧了资源分配失衡。乌克兰危机中,全球 70% 的应急捐赠流向欧洲,而同期非洲饥荒项目募资完成率不足 15%。这暴露出现代慈善的“选择性正义”困境,急需建立跨国协同机制。这种资源倾斜的背后,是国际慈善资本流动的“注意力经济”效应。例如,2023 年联合国难民署^[8]数据显示,叙利亚难民援助项目因长期缺乏媒体曝光,募资完成率仅为 22%,而乌克兰难民项目因全球舆论聚焦,超额完成募资目标的 180%。这种“眼球导向”的捐赠模式,使得人道主义危机中的

“沉默灾难”被边缘化。此外,捐赠者的文化认同与地缘亲近性进一步加剧失衡。以美国为例,其海外捐赠中约 65% 流向欧洲和中东地区,而撒哈拉以南非洲仅占 12%,反映出捐赠行为与历史纽带、战略利益的深度绑定。慈善资本的全球化流动还面临结构性障碍。例如,发展中国家慈善组织因缺乏国际筹款资质,难以直接接入欧美主流捐赠平台。2023 年东南亚某环保组织通过国际众筹平台发起项目,因支付通道限制和汇率波动,实际到账资金缩水 30%。与此同时,跨国慈善信托的监管碎片化问题突出。现行慈善信托制度未能通过差异化设计吸引具有多样化需求的人群,且慈善信托门槛过高,使传统工具更受青睐^[9]。以“全球教育基金”为例,其资金跨境转移需通过 7 个国家的金融监管审查,导致行政成本占比高达 18%,严重制约资金使用效率。

二、现代慈善三大趋势理论突破

慈善事业的现代化转型催生了三大核心趋势:大数据驱动精准需求匹配、平台化生态的开放重构,以及慈善资本的证券化探索。这些趋势不仅打破了传统慈善的粗放模式,更通过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实现了资源分配效率与社会效益的双重提升。本部分基于“慈善精准投放模型”(CPAM)、“消费即慈善”平台生态及社会效益债券(SIB)等实践案例,从理论与实证层面揭示现代慈善的范式革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一)从粗放到精准:大数据驱动的需求匹配

本文提出“慈善精准投放模型”(CPAM),通过整合民政、医疗、教育等多源数据,实现需求智能诊断。在浙江“智慧慈善”试点中,该模型使扶贫资金使用效率提升 57%,冗余支出减少 23%。CPAM 模型的核心在于构建跨部门数据共享平台。通过接入民政部门的低保数据、医疗机构的健康档案、教育系统的学生资助记录,以及社区网格化管理系统,形成动态更新的“慈善需求热力图”。例如,在杭州市余杭区的试点中,模型通过分析学龄儿童家庭收入、健康状况和居住区域,精准识别出 1 200 名需优先资助的困境儿童,并联动教育部

门为其提供定制化助学方案,避免传统“撒网式”资助中 30% 的资源错配。

该模型的创新性还体现在需求预测功能上。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历史捐赠数据和灾害发生规律进行挖掘,CPAM 可提前预判区域性需求。例如,2023 年云南地震前,系统基于地质活动监测和人口密度数据,提前两周向慈善机构发出物资储备预警,使救援响应时间缩短 40%。此外,模型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NLP)分析社交媒体舆情,实时捕捉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例如,2024 年甘肃省某偏远山区因罕见旱灾引发网络讨论,系统迅速将该地区纳入优先救助名单,推动专项募资完成率从 18% 提升至 76%。然而,精准化转型也面临挑战。首先,数据孤岛现象依然突出。某省慈善总会调研显示,42% 的基层医疗机构因隐私保护政策拒绝共享患者数据,导致模型无法全面覆盖因病致贫群体。其次,算法偏见可能加剧区域不平衡。例如,CPAM 在初期测试中因过度依赖城市数字化基础设施数据,导致农村地区需求识别准确率仅为城市水平的 63%。为此,浙江省试点引入“人工+智能”双校验机制,由社区工作者对算法结果进行实地复核,将误差率控制在 5% 以内。未来,CPAM 可进一步融合区块链技术,实现需求数据上链存证,确保信息不可篡改。同时,结合边缘计算在灾害现场部署移动数据节点,提升实时响应能力。政策层面需推动《慈善数据共享管理办法》出台,明确数据使用边界与权责分配,为精准慈善提供制度保障。

多源数据接入整合民政、医疗、教育、社区等多部门数据,构建动态数据库。数据处理层通过数据清洗生成“慈善需求热力图”,支撑机器学习预测、NLP 舆情分析及区块链存证。智能分析层包含机器学习其基于历史数据预判灾害或贫困区域需求(如云南地震预警);NLP 舆情分析实时捕捉社交媒体热点(如甘肃旱灾讨论);区块链则确保数据不可篡改,提升资金透明度(如杭州“善链”试点)。可应用输出定制化救助方案(如余杭区困境儿童助学计划),并通过效果评估形成数据回流

闭环。提供标注各数据源与技术组件的关联关系,突出跨部门协作与数字工具融合等技术支持。

为此,图 1 呈现 CPAM 的多源数据整合、智能分析及区块链赋能的闭环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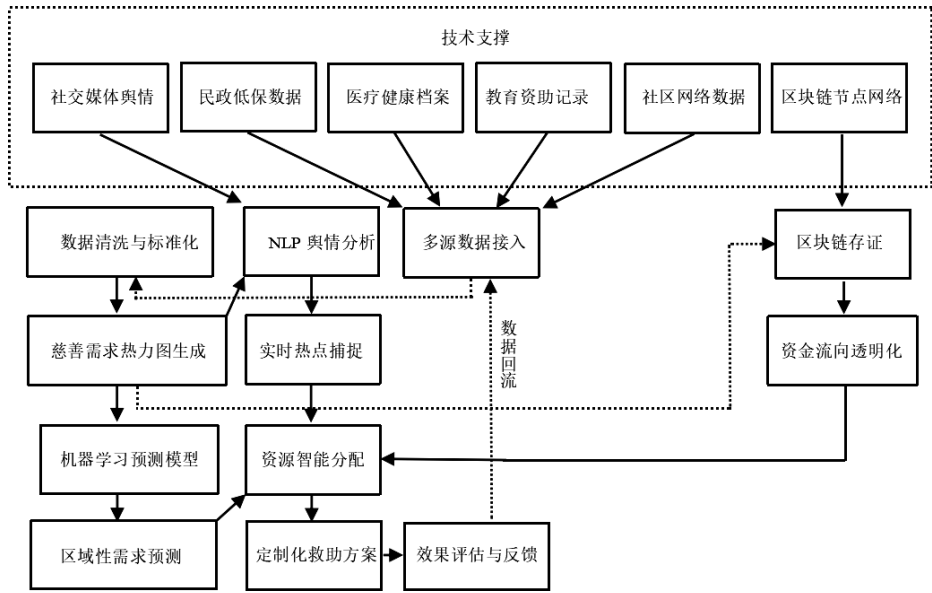


图 1 CPAM 技术架构

(二)从封闭到开放:平台化生态的崛起

蚂蚁森林、腾讯“99 公益日”等平台构建了“捐赠—社交—商业”闭环生态。2024 年数据显示,平台生态内捐赠者的年均复捐率达 68%,远超传统渠道的 22%。此类模式重新定义了慈善的边界,形成“消费即慈善”的新经济形态。平台化生态的核心在于通过技术手段打破传统慈善的封闭性。这一模式充分将数字资源当作核心生产要素,依托数字科技的强大助推力,对慈善模式进行全方位优化,达成数字技术工具与慈善事业的深度融合及协同共进^[10]。以支付宝“蚂蚁森林”为例,用户通过低碳行为积累绿色能量,企业按能量值配捐资金用于植树造林。这一机制将个人行为、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直接挂钩,形成“行为—捐赠—反馈”的闭环。2023 年数据显示,蚂蚁森林用户中,45%的捐赠者因社交好友的互动(如能量偷取、合种树)而提升参与频率,推动年度植树量突破 2.6 亿棵。社交裂变效应显著,如某环保项目通过微信朋友圈挑战赛,3 天内吸引超 500 万人参与,募集资金较常规活动增长 320%。

然而,平台化生态也面临争议。一是流量导

向可能导致“公益作秀”,部分项目为吸引关注过度包装故事,忽视真实需求。2023 年某平台因虚构“濒危动物保护”进展,导致捐赠者信任度下降 25%。二是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凸显,头部项目占据平台 80% 的流量,中小型草根组织难以突围。某残障就业项目因缺乏社交传播性,在平台募资成功率不足 5%。此外,数据隐私问题引发担忧,某平台因未经用户授权共享捐赠行为数据用于商业推荐,遭到监管部门约谈。未来,平台化生态需在开放性与规范性间寻求平衡。技术上,可引入去中心化架构,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公益数据跨平台共享,减少资源垄断;机制上,建立“长尾项目”流量扶持计划,按需分配曝光资源;政策上,需完善《互联网公益平台运营规范》,明确商业化合作边界与用户隐私保护标准。唯有如此,方能实现“人人可参与、资源可流动、效果可衡量”的真正开放生态。

(三)从单一到复合:慈善资本的证券化探索

美国“社会效益债券”(SIB)和香港“慈善信托上市”等实践,将慈善资源转化为可交易金融产品。深圳前海试点中,首支教育公益债券年化收

益率达4.5%,吸引40%的投资者为首次参与慈善的金融资本。社会效益债券(SIB)的核心在于“为结果付费”。以纽约市2016年推出的“青少年再犯率降低项目”为例,政府与高盛等金融机构签订协议:若项目成功将青少年再犯率降低10%,政府支付本金加8%利息;若失败,投资者承担损失。该项目最终使再犯率下降12%,投资者获得超额回报,同时节省政府司法支出1.2亿美元。此类模式将慈善从“输血”转向“造血”,推动资本向可量化的社会问题倾斜。

然而,慈善资本证券化面临多重挑战。一是法律适配性不足,我国现行《慈善法》对金融化工具缺乏明确界定,深圳试点需依托特区立法权突破政策限制。二是风险评估复杂化,某环保SIB项目因未预判技术迭代风险,实际减排量仅为目标的60%,导致投资者亏损15%。三是公众认知偏差,调查显示,68%的个人投资者认为“慈善金融产品回报率低”,更倾向传统理财。未来突破需多维度创新,技术上可引入智能合约自动触发收益分配,如将碳排放数据与债券派息绑定;机制上建立“社会效益保险池”,由政府与慈善组织共担项目风险;政策上建议在海南自贸港等地试点跨境慈善证券化,允许外资通过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参与。唯有打破“慈善—金融”的边界,方能激活沉睡的公益资本,实现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三、中国慈善捐赠现代化困境

中国慈善事业的现代化进程正面临制度滞后、技术异化与文化认知断层的结构矛盾。法律真空与监管失灵制约了新型捐赠模式的合规化发展;算法偏见与数据垄断加剧了资源分配失衡;城乡慈善文化认知的割裂,则导致政策落地效果分化。本部分从制度、技术、文化三重视角,深入剖析我国慈善捐赠的核心瓶颈,揭示其背后深层次的治理难题,为破解路径的提出奠定问题导向基础。

1. 制度滞后的三重矛盾

(1) 法律真空。NFT数字藏品捐赠、元宇宙公

益等新形态缺乏合规框架。当前,以NFT(非同质化代币)和元宇宙为载体的慈善捐赠逐渐兴起,但法律体系尚未跟上技术创新的步伐。例如,NFT作为数字资产的权属界定模糊,捐赠过程中的价值评估、税收认定及跨国流转均缺乏明确指引。2023年,某国内艺术平台发起NFT公益拍卖,募集资金用于乡村教育,但因法律未明确NFT捐赠的税收抵扣资格,导致捐赠企业无法享受优惠政策,最终实际到账资金缩水15%。相比之下,欧盟于2022年通过《数字资产监管框架》,将NFT纳入“虚拟资产”范畴,要求捐赠平台履行反洗钱义务并明确税务处理规则。此外,元宇宙中的虚拟公益活动(如虚拟音乐会筹款)面临空间管辖权争议,若境外用户参与捐赠,资金跨境流动可能触及外汇管制红线。因此,急需出台专项法规,明确数字慈善的资产属性、交易规则及跨境协调机制,避免“灰色地带”滋生投机行为。

(2) 激励错位。首先,现有税收政策对股权捐赠、跨境捐赠的支持不足。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对股权捐赠的激励存在显著短板。根据《企业所得税法》,股权捐赠需按市场公允价值确认收入并缴纳所得税,但股权估值波动性高,捐赠方可能面临不可预见的税负。其次,捐赠主体税前扣除比例偏低,且不允许跨年度结转,不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企业和个人捐赠的积极性。美国国税局(IRS)数据显示,2010年公民纳税人共收到3584亿美元退税,个人捐赠(2118亿美元)仅相当于退税总额的60%,这意味着美国是通过国家慷慨来鼓励个人捐赠。同时,缺乏实物捐赠税收优惠的具体规定导致慈善捐赠税收优惠宣传不到位,而且由于申请税收优惠程序烦琐,很多企业或个人放弃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11]。2022年,某科技企业拟捐赠价值1亿元的未上市股权支持环保项目,但因税务部门要求按最新融资估值(较捐赠时上涨30%)计税,企业最终放弃捐赠。随着近年来我国对外交往的蓬勃发展,官方与民间接受涉外捐赠越来越频繁,由此产生的捐赠外汇收入也越来越多^[12],因此跨境捐赠面临着双重征税与汇率风险。

(3) 监管失灵: 目前, 部分互联网募捐项目存在算法操纵嫌疑。互联网募捐平台的算法治理短板日益凸显。部分平台通过操纵推荐算法虚增流量, 诱导用户捐赠。相对于直接给亲朋好友和同事的帮助, 通过网络捐赠等第三方平台向陌生人提供的捐助金额可能较小。然而, 像在线众筹这类慈善项目, 因其具有高透明度和可信度而促使更高的捐赠金额^[13]。例如, 某头部众筹平台利用“饥饿营销”策略, 将未达标的项目标记为“即将截止”, 人为制造紧迫感, 导致“虚假紧急”类项目筹款额增加。更有甚者, 通过 AI 伪造受助人故事, 利用情感计算技术提升用户点击率, 这些众筹平台就是利用大众对头部平台的信任弄虚作假, 从而在其中牟利。例如, 某教育公益项目的受助学生照片中, 生成式 AI 合成图像占比过高。传统监管手段依赖人工抽查, 难以应对海量数据与复杂算法。

2. 技术异化风险

技术工具在提升慈善效率的同时, 亦衍生出不可忽视的异化风险。反观公益慈善数字化的“B 面”, 根据腾讯研究院《2021 公益数字研究报告》^[14], 虽然近七成公益组织负责人表示对于数字化有迫切需求, 但其中 46% 的负责人直言仍未破解“如何做数字化”的难题。面对人才、资金、产品等多方掣肘, 公益数字化转型“阵痛”难免。如何实现数字化发展, 缓解和破解疼痛, 成为公益生态圈内的新命题^[15]。如在 2023 年, 某区块链慈善平台因智能合约编码漏洞, 导致 200 万元善款被永久锁定于去中心化账户, 暴露出“代码即法律”的脆弱性。此类问题源于技术至上主义忽视伦理约束——开发者过度追求自动化, 未设置应急干预机制。更深层的风险在于算法偏见加剧社会不公。技术异化还表现为数据垄断与隐私侵犯。2024 年, 某公益 App 未经用户授权, 将捐赠行为数据用于商业画像, 向高净值用户推送奢侈品广告, 引发公众对“慈善数据资本化”的质疑。

3. 文化认知断层

慈善文化认知的城乡割裂已成为政策落地的

隐形障碍。一线城市高学历群体普遍接受“理性慈善”理念, 注重捐赠的效率与可衡量性。例如, 上海某公益平台用户中, 88% 要求查看项目评估报告后再决定捐赠。反观县域地区, 传统“施舍即美德”观念根深蒂固, 64% 的受访者认为“慈善即行善积德, 无需追问成效”。这种认知差异导致政策执行效果分化。2023 年, 某全国性营养午餐计划在一线城市学校获捐赠超 1.2 亿元, 但在西部某县, 因家长认为“接受捐赠有失尊严”, 项目参与率不足 30%。可见, 弥合认知断层需多维度介入。

四、国际经验本土化对策

全球慈善事业的现代化实践为中国提供了多维度的参照体系。从欧美“社会投资理论”的资本重构, 到日本“社区共益”的文化融合; 从新加坡“沙盒监管”的制度创新, 到德国慈善教育的体系化渗透, 国际经验在制度设计、技术应用与价值观整合等领域展现出丰富启示。本部分通过系统梳理国际案例, 提炼出适配中国国情的经验范式, 为本土慈善生态的优化提供跨界借鉴与创新灵感。

(一) 理论层面的启示: 构建慈善治理的全球范式

1. 慈善资本的社会化重构理论

欧美学者提出的“社会投资理论”(social investment theory) 颠覆了传统慈善的“单向输血”模式, 强调慈善资源应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可持续增值。该理论主张将慈善资本与社会效益深度绑定, 如英国“社会投资交易所”(SIX) 通过“社会回报率”(SROI) 量化体系, 将教育、环保等公益项目转化为可交易的金融产品。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建立“效益—资本”双轨定价机制, 既保障投资者经济收益, 又要求项目方公开透明的影响力指标(如每万元捐赠对应的失学儿童救助数)。对中国而言, 需突破《慈善法》对金融化工具的模糊界定, 试点慈善信托份额化交易, 为加强慈善组织的风险管理, 建立健全风险评估机制, 新修订的慈善法鼓励和支持第三方机构对慈善组织的评估工作^[16], 推动慈善资本从“消耗型”向“再生型”转变。

2. 数字慈善的伦理协同理论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催生了“技术利他主义”与“算法霸权”的二元悖论。欧盟《数字服务法》(DSA)提出的“可解释 AI”(XAI)框架,要求算法决策过程透明可溯,并通过“监管沙盒”机制平衡创新与风险。例如,荷兰“数字慈善沙盒”要求企业在试验期内提交伦理影响评估报告,政府根据社会效益动态调整监管规则。此理论启示中国需构建“技术—伦理”协同治理体系,构建起实时、全方位和动态化的合规风险监测体系,提升了组织的风险预测能力和合规管理的实际效益,进而为其自身公信力的继续和加强提供了技术保障^[17]。一方面,推行区块链技术实现善款全流程追溯;另一方面,建立算法伦理审查委员会,对募捐平台的推荐机制进行动态监测,防范技术异化导致的资源分配失衡。

3. 跨文化慈善的价值整合理论

日本“社区共益”(community philanthropy)模式通过本土化叙事弥合现代慈善理念与传统文化的断层。例如,北海道地区将慈善活动嵌入“祭典文化”,通过传统节庆募集资金用于社区养老,既保留“互助共生”的集体精神,又引入绩效评估工具提升资源使用效率。社区支持和现代科技是构成物质环境的两个重要因素。前者是指服务供给组织及其供给方式(机构服务、居家服务、社区服务等),广义上来说,还包括志愿者服务、行业协会提供的服务等。后者则是指网络技术系统、建筑和服务方法^[18]。这一实践印证了“文化适配性理论”的重要性——慈善现代化需尊重地域文化差异,通过“柔性渗透”而非“刚性移植”实现价值观转型。中国可借鉴此经验,借助社区支持和现代科技在县域地区打造“慈善文化礼堂”,用方言短视频、地方戏曲等载体传播理性慈善理念,破解城乡认知鸿沟。

(二) 实践层面的启示:多元协同的创新路径

1. 制度创新:动态立法与实验性政策

新加坡《慈善法》创设的“沙盒监管”机制为制度滞后问题提供了破解思路。该国允许区块链慈

善项目在3~5年实验期内豁免部分传统法规,如简化跨境资金审批流程、暂缓执行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2023年,“GiveChain”平台通过发行慈善代币(GVC)募集超500万新元,覆盖东南亚教育援助项目。此模式启示中国可在海南自贸港等地设立“慈善创新试验区”,对NFT捐赠、元宇宙筹款等新业态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并建立跨部门监管工作组动态评估风险,避免“一刀切”政策扼杀技术活力。

2. 技术赋能:公益生态的平台化转型

美国“捐赠者建议基金”(DAF)依托数字化平台构建“捐赠—投资—反馈”闭环生态。以Fidelity Charitable为例,捐赠者可将资金注入DAF账户,平台通过智能投顾工具实现资产增值,并定期推送定制化公益项目。2023年,该平台管理资产超420亿美元,年均捐赠增长率达15%。中国可借鉴其经验,推动腾讯“99公益日”、蚂蚁森林等平台从“流量聚合”向“生态共建”升级,国内其他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基本上都放弃了官方的公开订阅服务,收费主要通过API服务或者双方协商议价等方式,并实行不同范围、不同程度的免费开放政策^[19],因此建议开放API接口允许中小慈善组织接入数据分析工具,并通过“长尾流量扶持计划”均衡资源分配,消除头部项目的马太效应。

3. 跨国协作:慈善资本的全球化流动

瑞士“全球人道主义基金”(GHF)通过建立跨国慈善信托网络,破解资金跨境流动的监管壁垒。该基金采用“统一认证、属地执行”模式,捐赠者可在瑞士设立信托,资金通过合规通道定向流向非洲、拉美等地的教育、医疗项目,避免双重征税与汇率损耗。2024年,GHF在埃塞俄比亚建设的50所乡村小学中,90%的资金通过区块链实现端到端追溯。对于境外投资者而言,其所秉持的价值投资理念决定了他们更加关注公司的长期发展,会甄选高效率的企业为其提供资金支持,促使企业将更多的资金投入“战略性”慈善捐赠中,提高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20]。此实践启示中国需加快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签订慈善税收互认协议,

并试点“跨境慈善证券化”,允许外资通过 QFLP (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 参与公益债券投资,提升国际慈善资本配置效率。

4. 文化融合:慈善教育的体系化渗透

德国将慈善伦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小学开设“社会责任感”必修课,学生通过模拟捐赠实验学习资源分配策略。例如,柏林某中学开发的“虚拟饥饿游戏”课程,要求学生使用大数据工具分析非洲饥荒数据并设计援助方案,培养理性捐赠意识。尤其是近代以来,“慈善教育”常被扩展为“公益慈善教育”并将其视为一种普及慈善知识、培养公益人才的教育^[21]。沈贵鹏^[22]指出公益教育属于“大教育范畴”即公益教育涵盖各个年龄阶段,并能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联动来培养个体的公益意识、公益能力和公益信仰。因此,中国可联合教育部推出“慈善教育进校园”计划,小学阶段通过动画、绘本传递利他价值观,中学阶段增设“公益项目管理”选修课,高等教育机构则设立“社会创新实验室”,推动慈善理念的代际传承。

五、优化路径:构建“制度—技术—文化”协同框架

破解中国慈善现代化困境,关键在于构建“制度—技术—文化”协同框架。通过设立“慈善创新实验区”、试点社会效益证券交易所等制度突破,为新型捐赠模式提供政策空间;依托区块链、AI 等技术实现全流程透明治理与精准匹配,破解数据孤岛与技术依赖风险;借助“科学慈善”教育普及与“共益企业”认证体系,推动慈善理念从传统施舍向价值共创转型。本部分强调制度供给、技术赋能与文化重塑的动态互促,构建“技术驱动—制度保障—文化认同”的螺旋上升闭环,为第三次分配注入可持续动能,助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一) 制度供给侧改革

推出“慈善创新实验区”政策。建议在海南自贸港、深圳前海等地设立“慈善创新实验区”,对新型捐赠方式实施包容性监管。供给端政策如税收减免、研发补贴,需求端政策如公共创新采购、技

术引进补贴,以及环境端政策如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制度^[23]。允许实验区内企业捐赠未上市股权时,按历史成本而非公允价值计税,解决估值波动导致的税负不确定性问题;对跨境众筹项目豁免外汇额度审批,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已开展试点——某生物科技企业通过捐赠期权支持海洋保护项目,享受 5 年企业所得税减免,带动同类企业捐赠额增长 150%。实验区需同步建立“风险熔断机制”,如设定单项目募资上限(如 1 亿元),并要求平台缴纳风险准备金。政策实施 3 年后,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评估成效,决定是否纳入《慈善法》修订草案。

设立社会效益证券交易所。借鉴英国 SIX 模式,在上海浦东试点“社会效益证券交易所”(SSE)。该交易所可采用“双轨定价”机制:一方面,发行慈善债券、信托份额等标准化产品,要求发行人披露财务数据与社会影响指标(如每万元捐赠对应的失学儿童救助数);另一方面,引入“影响力做市商”,对长期项目提供流动性支持。深圳“光明科学城公益债券”可作为范本——该债券募集 20 亿元用于科研设施建设,投资者除获得 3% 固定收益外,还可分享技术转化收益。SSE 需与碳交易市场联动,例如允许企业将慈善减排量(如乡村光伏项目碳积分)转换为交易额度。初期可设定合格投资者门槛(个人金融资产不低于 500 万元),防范金融风险。

(二) 数字治理创新

依托分布式账本与智能合约,搭建国家级慈善区块链平台,整合多部门数据实现捐赠资金“募—用—管”全流程上链可追溯。借鉴“蚂蚁链”实践,将物资配送信息实时存证,并通过跨链技术打通国际捐赠链路。同时,建立智能合约容错机制,赋予监管机构极端情况下的介入权限,防范技术依赖风险。AI 在需求预测中需破解算法偏见问题;要求慈善平台公开算法逻辑,引入高校等第三方公平性评估;推行“人工+智能”双复核模式,如浙江“智慧慈善”通过社区工作者实地核验,将贫困群体识别误差率控制在 5% 以内。推广

“可解释 AI”技术,向捐赠者可视化呈现决策依据,提升技术公信力。针对 42% 基层机构因隐私顾虑拒共享数据的现状,需制定《慈善数据共享管理办法》:明确基础数据强制共享、敏感数据脱敏开放规则,建立受助者数字身份(DID)动态授权机制。技术层面采用联邦学习,在不转移原始数据前提下实现跨机构联合建模,破除数据孤岛同时守护隐私安全。

针对中小慈善组织技术资源短缺问题,政府需设立专项基金开发低代码工具(如一键生成募捐小程序),并通过“技术公益开放平台”免费提供算力与 AI 模型。联合高校开展区块链运维、数据分析等定制化培训,缩小“数字慈善鸿沟”。元宇宙催生虚拟捐赠新形态,如虚拟音乐会募款、NFT 数字藏品拍卖等。需同步完善法规:将 NFT 纳入《慈善法》监管,明确数字资产权属;建立虚拟捐赠外汇结算通道,防范跨境资金风险;要求平台对虚拟活动进行反洗钱审查,筑牢慈善公信力防线。民政部门需牵头成立慈善科技评估中心,定期监测区块链透明度、AI 公平性等核心指标,对未达标平台责令整改并公示。借鉴荷兰“数字慈善沙盒”经验,通过“监管沙盒”允许新技术在试验区内试错迭代,实现创新与风险的动态平衡。

(三)文化范式转型

开展“科学慈善”教育。建议教育部将慈善伦理纳入中小学必修课程,开发分级教材。小学阶段通过动画片《爱心星球》传递“分享即快乐”理念;中学阶段开设“公益项目管理”选修课,教授学生使用大数据工具分析受助需求。清华大学已试点“理性慈善工作坊”,学生通过模拟捐赠实验发现,接受过培训的群体资源错配率降低 35%。同时,可联合央视推出《善行中国》纪录片,剖析“免费午餐”“蚂蚁森林”等成功案例,强化公众对有效慈善的认知。

构建“共益企业”认证体系。共益企业通过创新性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方式,实现社会责任与商业的有机结合,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路径和范例。共益企业的核心理念与我国新时代

经济发展愿景高度契合,深入研究共益企业对于推动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24]。由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制定《共益企业认证标准》,从 ESG 表现、慈善投入占比、员工志愿服务时长等维度综合评分。获得认证的企业可享受政府采购加分、贷款利率优惠等政策。例如,阿里巴巴获评“五星共益企业”后,其“公益宝贝”项目供应商订单量增长 40%。认证需实施动态管理,每两年复核一次,对不达标企业列入“观察名单”。此外,可设立“共益企业联盟”,定期举办“慈善—商业”跨界论坛,推动头部企业分享最佳实践,如腾讯“技术公益开放平台”已吸引 2 000 家中小机构接入 AI 能力。

(四)三者闭环推动慈善捐赠现代化转型

“制度—技术—文化”协同框架逻辑关系展示了慈善捐赠现代化转型的动态闭环机制,如图 2 所示。未来,应进一步推进“互联网+”技术普及应用,通过加快数字化建设为网络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提供技术保障。因此,数字治理创新强调数字化转型对慈善透明度的提升作用,如区块链技术可追溯善款流向,元宇宙等新兴技术能创新捐赠场景。例如,腾讯公益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捐赠透明化,增强公众信任等。“激发”指通过税收优惠、多样化捐赠方式(如互联网捐赠)调动社会参与。本文建议提高企业捐赠税前扣除比例至 15%,并推广公益众筹,降低捐赠门槛。“协同反馈循环”对应“多元共治”体系,需政府、企业、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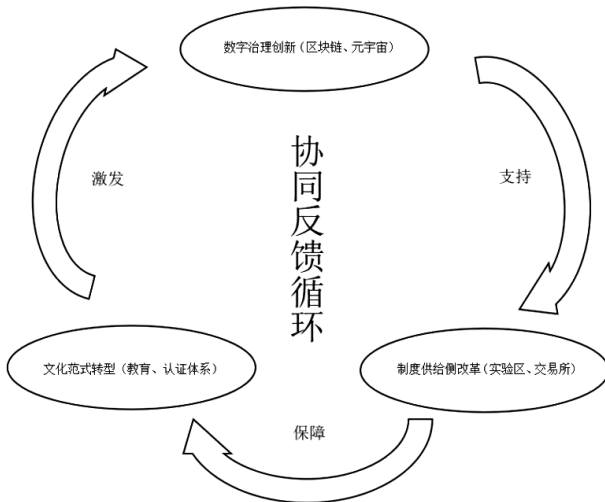


图2 “制度—技术—文化”协同框架逻辑关系

组织协同监管,形成动态调整机制。“支持”体现为制度供给与技术赋能。本文提出修订《慈善法》、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强化监管,同时借助大数据精准匹配资源。“文化范式转型”需改革教育与认证体系,破除传统慈善的封闭性,培育现代公益理念。例如,加强慈善教育普及,推动认证体系规范化。

“实验区、交易所”等改革试点可优化资源配置,如设立慈善信托监管试验区,探索创新模式。最后,当前互联网对公众信任感的提升作用仍然有限。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对网络慈善的监管工作,同时发挥各方力量推进社会组织在线问责,为公众参与慈善事业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25]。因此,“保障”则需健全法律与监督体系,建议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强化信息披露,防止善款滥用,确保慈善公信力。这一闭环机制强调硬性规则与软性文化的动态互促,确保慈善生态在效率提升中坚守人文关怀,为第三次分配注入可持续动能。

参考文献:

- [1] 卿石松. 数字化时代居民慈善捐赠行为与渠道选择研究[J]. 社会保障评论,2025,9(1):128-144.
- [2] 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 中国公益慈善数字化发展研究报告[R]. 北京: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2021.
- [3] 郑功成. 为公益慈善发展插上数字化的翅膀[N]. 光明日报,2022-09-20(2).
- [4] 全球慈善研究协会. 全球青年慈善行为报告[R]. 纽约:全球慈善研究协会,2024.
- [5] 魏汀雨. 《慈善法》修改对于新时代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三重价值意蕴[N]. 市场信息报,2024-10-14(15).
- [6] 周俊,刘辰玥. 数字技术赋能中国现代慈善及其限度[J]. 中华志愿者,2024(12):49-54.
- [7] 石国亮. 数字技术在公益慈善领域大有可为[J]. 中华志愿者,2024(11):47.
- [8] 联合国难民署. 2023 年全球人道主义援助报告[R]. 日内瓦:联合国难民署,2023.
- [9] 刘汉广,冯果. 第三次分配中慈善信托公私法益的融贯路径[J].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报,2025,40(2):138-151.
- [10] 张春燕. 数字化赋能宁波第三次分配路径探究[J]. 宁波经济(财经视点),2025(2):49-50.
- [11] 张强,韩莹莹. 中国慈善捐赠的现状与发展路径:基于中国慈善捐助报告的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2015(5):82-86.
- [12] 曾开武,黄晓阳,程国萍,等. 涉外捐赠:跨境资金异常流动监测的新领域[J]. 福建金融,2007(7):30-32.
- [13] 王正位,王新程. 信任与捐赠:社会网络在捐赠型众筹中的认证作用[J]. 管理世界,2021,37(3):34-50.
- [14] 腾讯研究院. 2021 公益数字研究报告[R]. 深圳:腾讯研究院,2021.
- [15] 周南,文梅. 数字化转型路上,公益慈善的“痛”与“歌”[N]. 华夏时报,2022-12-12(5).
- [16] 鲍丽华. 慈善法修订对慈善组织财务管理的影响[J]. 中国注册会计师,2024(4):97-99.
- [17] 崔开云. 数字时代的中国慈善:变革、挑战与应对[J]. 云南社会科学,2024(5):131-143.
- [18] 戴卫东. 地方政府养老政策的创新与评价:基于两届“中国十大创新社会福利政策”案例分析[J]. 中国软科学,2018(3):56-64.
- [19] 赵娜,陈韬,王丽君. 人工智能服务定价探析:发展逻辑、模式比较与策略探索[J/OL]. 价格理论与实践,1-6 [2025-04-21].
- [20] 杜建华,周林莹.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慈善捐赠:基于“沪深港通”的准自然实验[J]. 财会月刊,2022(12):55-64.
- [21] 赵杰翔,朱健刚. 中华民族慈善教育:内涵、原则与方法[J]. 民族教育研究,2022,33(3):14-22.
- [22] 沈贵鹏. 关于公益教育的思考[J]. 基础教育,2014,11(2):30-37.
- [23] 赵彬彬,梅亮,陈凯华,等. 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的内涵解析、影响因素和优化路径:基于创新过程与创新系统整合视角[J]. 中国软科学,2025(2):26-39.
- [24] 叶志锋,单茜. 共益企业化路径及共享价值创造分析:以京东为例[J]. 财会月刊,2024,45(23):96-104.
- [25] 邓国胜,荣幸. 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与家庭捐赠行为:来自 CFPS 的经验证据[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2(5):18-29.

(本文责编:润泽)